

三星堆文化的实物与观念:兼论文字与文明

施劲松

(北京 100101)

摘要:三星堆文化是否存在文字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至今为止,在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文字。从整个古代世界看,并非每个文化都独立创制文字,在公元前两千纪后半叶的东亚,只有商文化发明了文字。文字一经发明便成为沟通天地、统治社会的工具,因而被商王朝的社会上层专控,文字只随商人制作的青铜器流传,并不为其他区域文化掌握。三星堆文化很可能没有自身的文字,也未接受商文化的文字,但三星堆文化以特定的器物来保存、传递经验知识,以奇异的组合铜器来充当沟通人神的中介,以特殊物品建构出的宏大场景来表达其知识体系、宗教信仰和世界观。三星堆文化“象形”的物发挥了文字的功能,这增补了我们对文字与古代文明的认识。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文字;文化格局;青铜器;观念表达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25)02-0092-08

一、问题的提出

三星堆文化是大约从公元前13世纪开始的青铜文化,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中心就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1920年代末,1934年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此后,在三星堆发现了城址和各类遗存,特别是于1986年和2019年后两次发掘了8座祭祀器物坑^①,出土上万件遗物,揭示出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曾经存在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区域文明。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令人激动和震撼,这个文化的独特面貌更是引发人们广泛的关注。面对考古新发现,学界和公众都普遍关切并经常提出同一个问题:在三星堆为什么没有发现文字?

对于认识、理解三星堆文化,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忽略,但却难以简单回答。这一笼统的提问实际包含着多个不同的具体问题,人们

对答案也有着不一样的期待。这个问题暗含的内容至少包括:在三星堆有没有发现文字;三星堆人是否有自己的文字,或者是否使用其他文化的文字;怎么理解发达的三星堆文化没有文字,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分析上述问题,然后再基于现有的考古发现,针对不同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解答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三星堆文化,同时更好地理解古代文明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二、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

首先需要回答并有明确答案的是,至目前为止,在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任何文字。从1934年至今的90年,在三星堆发现了城址、祭祀遗存、手工业遗存、建筑、墓葬、器物坑,出土了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等,但从中只发现具特定含义的图案和符号。比如,1号祭祀器物坑出土1件金杖,杖端有一组人头像,之后有两排四组相同的图案:一支箭越过

作者: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只立鸟射中一条鱼。三星堆的陶器上也刻有单独的图案或符号，比如高柄豆的座上有眼形图案，柄上有鸟形图案，动物头部有半月形图案等^[2]。三星堆祭祀器物坑的铜器上也有眼形纹、太阳形纹等，它们也都不是文字。

但考古发现具有偶然性，现在未发现文字并不一定意味着当时就没有文字。如果排除这种偶然性，从现有的考古材料判断，那么我认为三星堆文化可能没有自己的文字，在三星堆遗址也不太可能出土其他文化的文字。对此需要从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谈起。

大约从公元前1700年开始，以二里头文化的出现为标志，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中国文明也开启了以中原文化为引领的新阶段。但目前我们还未发现二里头文化的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现今已有很多线索。比如，在郑州二里冈和小双桥遗址发现甲骨文和陶文，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上有朱书的文字。再向前追溯，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铭刻，距今9000~78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龟甲上就出现了刻符^[3]。尽管如此，目前公认的、成熟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晚期，即商代都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商文化是公元前两千纪后半叶东亚地区最发达的文化，规模宏大的都城与陵墓，发达的手工业，延伸至遥远区域的资源与技术流通网络，规范的等级制，体系化的宗教信仰等，都表明商文化的发达程度和商王朝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区域的文化与政体。殷墟的甲骨文和金文正是由这样的文化创制的。

反观其他区域文化，它们虽然在文化面貌上独具特色，或者文化也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但都没有发明文字。在中原以外的一些区域，在商时期的陶器、石器上也都有刻符。比如在江西樟树的吴城遗址，在120件陶质和石质器物上发现符号和图像，有的符号也被认为可能是记事性和记数性的文字^[4]。但这些符号并不能确定为文字，与甲骨文和金文并不相同。在四川地区，东周秦汉时期还流行一类

巴蜀符号，它们主要铸刻在具有当地特色的青铜兵器、工具、印章，以及少数乐器和容器上。按最新的统计成果，四川及邻近地区出土的带巴蜀符号的青铜器883件，符号有272种，符号组合1125组^[5]。巴蜀符号有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几何形等，符号和组合都很简单，有的符号只见于或更集中于某一地。巴蜀符号流行时四川地区已出现汉字，因此，这些符号可能具有族徽之类的性质，而不是文字。可见，并非每一个区域、每种文化都能独自发明文字。从世界范围内看也如此，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希腊，都有自己的文字，但也不是每个古代文明都独立创制了文字。因此，如果三星堆文化没有产生自身的文字，这是容易理解的。

三、中国早期文字的创制与流传

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早期文字的创制与流传。

商代晚期出现的文字，见于甲骨和青铜器上。甲骨文契刻于龟甲和兽骨上，主要内容是占卜通神的卜辞，也有少量的记事刻辞。这类占卜是商王室的行为，占卜和刻写卜辞的贞人也属于王室。所以商代的甲骨文主要出自殷墟，此外只在郑州、济南有极少数的发现。商代之后，周人的甲骨文字在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北京都有发现。西周的甲骨文仍然集中于周人在岐山和扶风的政治中心，尽管占卜机构开始扩大到王室以外。

金文铸刻于青铜器上，文字随铜器流传。中原地区从二里头文化开始出现具有组合关系的青铜器，但青铜器上尚无铭文。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始有铭文，商和周的青铜器铭文从简单到复杂，内容丰富。最早的青铜器生产和铭文的铸刻都由王室严格控制。对于早期国家而言，运用陶范制造青铜礼器，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青铜冶炼业包含采矿、冶炼、铸造、资源进贡，乃至产品分配等多个环节，铸造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铸造由王朝专控，生产铜礼器的

作坊都位于二里头、郑州商城和洹北商城这样的王朝都城内。即使到了商代晚期,重要、大规模的铸铜作坊仍然主要在殷墟范围内,或者是围绕殷墟的核心分布。在都城以外的其他地区,近年来也不断发现铸铜遗存,但出土的陶范不多,很多地区只掌握石范技术,难以生产复杂的青铜容器。有学者据此认为以青铜器为核心的贵重物的生产和产品流通,构成了早期国家的经济主干,支持了社会等级制的形成和运行^[6]。

和青铜器铸造技术一样,文字在发明之初只被极少数人掌握,并受到更加严格的控制。在人类历史上,发明文字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文字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人类摆脱了“自然人”的状态而开始向“文化人”“文明人”转化,更重要的是文字从创立伊始就与权力密不可分。张光直指出文字就是古人“攫取权力的手段”,“文字记录曾保守过统治人类世界的秘密;文字载体之所以能与它包含的信息融为一体,原因是一旦人发明了书写,文字本身便成为沟通天地之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7]。商人将表达事物性质、意义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文字便与青铜器成为一个整体,并由此表达特定思想,如此,文字记述的内容和青铜礼器本身的含义都被深化了。

我们再来看考古材料。商代大量带铭文的青铜器都出自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在商文化区之外,也发现不少带铭文的青铜器,但它们都是商式器物,是由商人制作的。在商代晚期,商文化区以外的很多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各地开始生产具有当地风格的青铜器,但这些不同于商式青铜器的地方性器物上全无铭文。这一现象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原以外的区域文化发展程度与商文化并不一致,使得文字不能被简单模仿、套用,更不能真正被接受。一般而言,区域文化首先接受的是中原青铜器的制造技术,进而接受中原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但并未全盘接受中原铜器的组合和器用制度,也没有掌握中原

铜器上的文字。另一方面更重要,那就是文字是统治权力的工具,当时只为商王朝社会上层少数人掌控。

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用长江流域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来具体说明。长江流域出土的相当于殷墟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不少带铭文。带铭文的青铜器在湖南发现最多,比如桃源出土的方罍盖上有“皿天全作父己尊彝”,宁乡黄材人面方鼎上有“大禾”、分裆鼎上有“己冉”,宁乡炭河里卣上有“癸冉”、罍上有“冉父乙”,王家坟山卣上有“戈”,衡阳汉墓出土的商代爵上有“父乙”“子荷贝”等。带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在湖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也有发现。长江流域带铭文的青铜器以爵、鼎、卣较多,还有觚形尊、觶、罍、簋、甗,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商式或中原式器物。在长江流域,特别是在湖南和江西还出土大量具有地方风格的青铜器,包括湘江流域和新干大洋洲的铜器群,其中没有一件地方性器物上有铭文。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部分是容器,目前所知的有圆尊、方尊、圆罍、方罍、觚形器、甗、盘、器盖等。它们之所以让人感到熟悉,是因为这些器物的基本形制和纹饰都来自商式铜器。正因为有了这部分铜器,才使我们得以建立成都平原与中原、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的联系。三星堆青铜容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大口尊和罍,同样的尊和罍在长江中下游、特别是在两湖地区有较多发现。三星堆和两湖地区的尊罍具有明显的共性,而与商式的尊罍存在一定差别,这种共性和差别在形制和纹饰上都有体现,并由此成为长江流域青铜器的风格^[8]。这类青铜容器产地应在长江流域而非中原。长江中游的这类尊罍均不带铭文,三星堆的青铜容器上同样也没有文字。

三星堆出土的非容器的其他所有铜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商式铜器完全不同,这些当地生产的器物更不会有商式铜器上的铭文。

前述三星堆金杖上的人头像和鱼鸟图

案,也见于成都金沙遗址的1件被认为是冠的金带上,区别仅在于金带上的图案为一排四组,人头像简化为圆形人面并位于鱼鸟图案之间^[9]。学界目前尚不知晓这组图案的确切含义,但两个中心遗址的权力象征物上的相同图案,很可能记录了当时的重大事件,或者与族属、王权等相关的关键信息。以图案记录、传达如此重要的内容,恰好表明三星堆文化没有文字。

但在三星堆遗址之外,成都平原其他地点出土过带铭文的铜器。1959年在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1号窖藏的陶缸内曾出土21件青铜器,其中的2件觥上各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己”铭文^[10]。竹瓦街青铜器具有商末或西周早期铜器的特点,应当是从北方流传到成都平原的外来铜器。1985年在广汉西门外出土1件觚形尊,器形、纹饰都与中原商代晚期铜器相同,尊上带“罍”(或释为“潜”)字铭文^[11]。

竹瓦街的觥和广汉西门外的尊都是中原式铜器,产地在中原。它们不属于三星堆文化,因而器上有铭文,铭文随铜器进入到成都平原。在此之后,四川地区在战国时期出现文字,川西新都大墓的铜鼎上即有铭文“邵之食鼎”,荣经同心村、蒲江、青川出土带“成都”铭文的铜矛和戈,重庆小田溪M3既出带巴蜀符号的矛,同时出“廿六年蜀守武造”等内容的戈。荣经、青川等地战国墓出土的漆器上也有“成”“成亨”等汉字。

四、三星堆器物群的观念表达

对于是否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文字之类的问题,我们可以据事实明确回答。对于如何看待三星堆文化很发达但却没有文字这样的疑惑,则需要从多角度解释。

关于文字的产生,中外都曾将这一重大发明归功于某位圣贤或是神。中国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苍颉造字,如《吕氏春秋·君守》云“苍颉作书”,《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根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我们知道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

的汉字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更早的郑州二里冈、小双桥、襄汾陶寺等遗址中的文字,是探寻汉字起源的线索。

殷墟的甲骨文主要是卜辞,其性质与巫术有关。即早期汉字用于沟通人神,是巫史与神灵的中介,因而汉字的产生并不是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或是思想交流的产物;相应地,创制、掌握文字的人也是商王和王朝内部的巫史集团,最初的汉字就直接来源于人们对人神熟知的自然物象的客观描写^[12]。

对于西亚和埃及文字的起源,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苏美尔神话及其后的文献都记录了文字最早的起源,其共同点是认为文字在一夜之间发展成熟,这样的认识一直延续到18世纪。此后人们又认为所有的文字都起源于叙述性的图画。但乌鲁克出土的泥版改变了象形文字的理论,考古发现表明,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产生的初期,象形符号很少被使用。目前的一类研究认为,西亚文字的前身是一种被称为“陶筹”的计算工具:公元前3700年近东出现了用黏土烧制成的陶筹,代表特定交易的陶筹被封存在封球中作为档案,封球的表面压印上了陶筹的印记;公元前3500年,泥版取代封球用以压印标记;公元前3100年至前3000年,象形文字由笔在黏土泥版上书写而成^[13]。

无论是西亚还是古埃及的文字,一般认为它们的发明是出于管理的需要。柴尔德认为,城市中掌管神庙的祭司集团担负着管理积聚的空前财富的艰巨任务,作为一个从事收集和管理庞大收入的团体,需要用文字来记录整个消费和支出^[14]。书写同样不被认为是作为公众交流的中介而发明的,而是为了管理机构的实际需要^[15]。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认为,文字最显著的作用是给宫廷与神庙的财产记账,并记录它们的再分配^[16]。

我们再回到三星堆。由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和长期的研究,我们对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都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在三星堆发现有城墙和大型建筑,出现了城和神庙,



图一 三星堆2号坑出土1号青铜树



图二 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金饰



图三 三星堆2号坑出土2号青铜树



图四 三星堆2号坑出土青铜面具

神庙内也积聚了空前的财富，包括青铜、黄金、象牙、海贝、玉石、绿松石、红玛瑙、丝绸等贵重物品和资源；青铜器铸造技术和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信仰等，从四方汇聚到三星堆。从多方面衡量，三星堆文化都可以称之为城市文明。但三星堆的统治者是如何管理这些财富的，这在目前还是一个完全没有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

三星堆文化时期，神权与王权共存，统治社会的王和巫史或祭司集团除了需要管理财富外，他们和殷商的统治阶层一样需要沟通神灵。不仅如此，三星堆文化的突然兴起并显现出的独特样貌，以及成都平原汇聚各方的财富与文化因素，还让我提出一个构想，即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一带可能存在一个观象授时、沟通自然、获取神秘力量的知识中心和神性中心^[17]。假若如此，那三星堆人在没有发明文字的情况下如何沟通神灵、如何表达宗教信仰，又如何保存和传递他们掌握的知识？对此，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三星堆出土的遗物来寻求解释。

三星堆祭祀器物坑中埋藏的遗物，应是神庙、或许还有宗庙内陈列的物品，它们保存了当时的文化、宗教、社会样貌等方面的丰富信息。我认为这些遗物集中、鲜明地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太阳崇拜，二是王权。与第一个主题相关的遗物，可能就包含有天文、数学的知识。常被引用的例子就包括2号坑出土的最

大的一件铜树（图一）。铜树上残存有象征太阳的9朵花和9只鸟，树干顶端或者天空中还有1只鸟，铜树和鸟可能表现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10个太阳。关于10个太阳，冯时认为或许与十进位有关，进而可能产生出十干，太阳的轮流出没又生出旬的概念^[18]。同属三星堆文化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中间为12道芒的太阳，周围分列4只飞鸟^[19]（图二）。这可能是象征一年12个月，以及春分、秋分、冬至、夏至^[20]。2号坑还有另一件大型铜树（图三），目前正与8号坑出土的残件拼合。孙华认为，三星堆的这两棵铜树表现的是神话传说中的东方扶桑和西方若木，以及太阳的东升西降；包括太阳神鸟金饰在内的三星堆和金沙的璧形器，象征的就是太阳和天空^[21]。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凸目大耳的大型青铜面具（图四），也被认为是太阳神^[22]。

我曾将三星堆祭祀器物坑中的所有埋藏物分为三类，即青铜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鸟等表现或象征崇拜对象的器物，“神坛”和各类人像等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青铜容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祭祀用品^[23]。随着大量新材料的出土、公布，又从不同的坑中拼合复原出多件重要器物，器物坑遗物和组合铜器成为研究的重点。张昌平将器物群中的人物形象和兽面具、眼形器等人格性形象分为祭祀者和受祭者，将其他器类归为祭器和祭品，认为这些展现祭祀场景的器物用于国家祭祀等

大型宗教活动^[24]。

组合铜器中有几件特别复杂。第一件是由2、3、7、8号坑出土构件拼合成的一件“神坛”，下为方座，座上有十三个人，其中四个人肩抬一神兽，神兽上的跪坐人像头顶一方座和圆台，台上是四件觚状器，其上又有四个跪坐的顶尊人像（图五）。第二件为2号坑出土的“神坛”，最下部为两只神兽，神兽上的圆台上有一个立人像，立人又头顶一方尊形器（图六）。第三件主体出自3号和8号坑，即一只神兽上有一个跪坐人像，头顶一件大口圆尊，神兽的头上还有一个立人（图七）。第四件为8号坑和2号坑出土残件拼合的铜器，一方形台上有一叠形器，叠盖上一倒立人像，双手按叠，昂首屈身，下体向上，鸟爪形足各踏一只飞鸟，人头顶上有觚形尊，尊盖上又有一头顶有羽状饰的立人（图八）。四件铜器的大体情况如此，细节却复杂得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神兽、顶尊人像、立人像等，或许也可以拼合、复原。

这类组合铜器不是一般的实用器具，显然也不是表现某种单一形象。学界一般认为它们表现的是供奉的场景。孙华认为这或是神兽、人、酒器组合，表现的是地上的人将巫师一类的神职人员及祭品送上天界的场景；或是神人与酒器组合，表现了天上的神派遣使者自上而下接受地上奉献的祭品，组合铜器是三星堆人宗教观念中连接天上神域与地上人世的纽带^[25]。黎海超认为这类铜器以兽、人、尊（觚）为核心要素，可能表现的场景是人乘于大象之上，头顶装满海贝等珍稀物品的大口尊，以礼仪姿态向上进献，体现的是三星堆社会对珍稀资源的获取^[26]。目前我们还不了解这些组合铜器的确切含义，但可以肯定它们都与祭祀内容、祭祀行为相关。此类铜器中的神兽、龙、鸟爪



图五 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青铜“神坛”



图六 三星堆2号坑出土青铜“神坛”



图七 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青铜神兽与顶尊人像



图八 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组合青铜器

形足的人等都不存在，人头顶的器物之上也不可能再站立人，因而这样的场景并不是记录或再现真实的祭祀活动，而是对观念的表达。

三星堆的很多铜器上还有独特的纹饰，常见的有太阳形纹、眼形纹、鸟羽形纹。玉器上也有纹饰，3号坑1件玉琮的两面即刻有两棵神树。这些器物上具有特定含义的纹饰，犹如青铜器上的铭文，深化了器物 and 纹饰共同表达的观念。

现在可以进一步确定，三星堆的这几个器物坑并不是祭祀坑，而只是埋藏了被毁的器物。所有的器物，表现祭祀场景的组合铜

器、象征性器物、用于祭祀活动的各种贵重物,全部都是神庙中的陈列物。在神庙中,所有的物品在某种观念和信仰之下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更复杂、更完整的场景。

通过对三星堆文化遗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三星堆人不仅通过神树、太阳神鸟等象形器物来保存、传递经验知识,还创造出各种奇异的组合铜器,它们同样充当了沟通人神的中介,并用于表达更为复杂、系统的信仰和观念。最后,所有具有特殊含义和用途的物品共同建构出一个宏大的场景,这个场景包含和表达的正是三星堆人的知识体系、宗教信仰和世界观。

在三星堆文化中,“象形”的物发挥了文字的重要功能,这个案例增补了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

附记: 本文是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核心聚落综合研究”课题“长江流域商代都邑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22YFF09036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2022年第7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4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4年第4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4年第4期。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院、三星堆研究院编:《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陶器·金器》,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9年,第388、389、427、464页。

[3]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2~32页。

[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编著:《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75~390页。

[5]严志斌、洪梅:《巴蜀符号集成》,科学出版社,2019年。

[6]Li Liu and Xingcan Che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2003.

[7]张光直著,郭净译:《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8]施劲松:《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文物》1998年第10期。

[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第三册,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1192、1193页。

[10]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

[11]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巴蜀》,文物出版社,1994年,图版91;敖天照:《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2008年第7期。

[12]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13页。

[13][美]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著,王乐洋译:《文字起源》,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96页。

[14][英]戈登·柴尔德著,李宁利译,陈淳审校:《历史发生了什么》,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86、98页。

[15][英]戈登·柴尔德著,安家瑗、余敬东译,陈淳审校:《人类创造了自身》,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40页。

[16][美]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著,王乐洋译:《文字起源》,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63页。

[17]施劲松:《中国青铜时代的三星堆》,《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18]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4~146页。

[1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第三册,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1193页。

[20]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21]孙华:《玉璧的造型渊源及象征意义——以三星堆和金沙村的璧形器为证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40~247页。

[22]孙华、黎婉欣:《中国上古太阳鸟神话的起源与发展——从古蜀文化太阳崇拜相关文物说起》,《南方文物》2022年第1期。

[23]施劲松:《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施劲松:《三星堆:考古学揭示的古代区域性文明》,《光明日报》2021年9月20日。

[24]张昌平:《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物所展现的祭祀场景》,《江汉考古》2023年第4期。

[25]孙华:《三星堆埋藏坑的组合铜器——三星堆神庙中沟通人神的供奉器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9期。

[26]黎海超:《“献贡”与祭祀——三星堆场景化铜器解析》,《考古》2024年第5期。

Material Remains and Conceptual System of the Sanxingdui Culture: With a Discussion on Writing System and Civilization Advances

SHI Jinsong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writing system in the Sanxingdui culture remains a highly concerned issue. To date, no written scrip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t the Sanxingdui site. Cross-culturally, not all cultures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their own writings.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 only the Shang culture invented a mature writing system, which immediately became a specialized tool for cosmic communication and sociopolitical control, monopolized by the Shang royal elites. It primarily circulated through bronze artifacts and was not adopted by other contemporary regional cultures. While the Sanxingdui culture probably lacked its own writing system and did not accept Shang scripts, it formed a set of rules: (1) specific artifacts were used to preserve and transmit empirical knowledge; (2) unconventional bronze assemblages were served as mediators of divine-human communication; (3) grand scenes constructed by special objects were used to express knowledge system, religious beliefs, and world outlook. These pictographic objects functionally paralleled written texts in conveying information, expan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writing in ancient civilization advances.

Keywords: Sanxingdui culture; scripts; culture condition; bronzes; conceptual expression

(责任编辑、校对:马志亮)

(上接第 107 页)

Three Critical Issue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s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uthern Frontier

WEI Kai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From the reigns of King Cheng and King Kang onward,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itiated large-scale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of its “Southern Frontier.” At its zenith, it not only controlled the upper Huaihe River Plain but also penetrated the Tongbai-Dabie mountains, further extending influence on the Yangtze River corridor. During the mid-late Western Zhou, pressured by Huaiyi incursions into the upper Huaihe River Plain and their frequent disruption of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regions to the south and north of Tongbai-Dabie Mountains, the Zhou people strategically retreated westward and consolidated control over the Nanyang Basin and Xiangyi area to maintain political connectivity with the “Southern Frontier”. This geopolitical shift enabled the Chu state to capitalize on this strategic vacuum,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Southern Frontier” and laying foundations for the subsequent occupation of the Jiangnan regi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outhern Frontier strategy reveals that while resources acquisition and tribute collection served as driving forces for the expansion into the Sou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urposes emerged as the dominant strategic priority.

Keywords: Western Zhou Dynasty; Southern Frontier; Huaiyi; Zeng state; Chu state

(责任编辑、校对:段姝杉)